

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取向—— 另一後設理論思路之提議*

臧國仁、蔡琰**

摘要

大眾傳播領域自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發跡迄今已逾半個世紀，疲態漸生，急需引進不同研究視角。本文建議以九〇年代起即已廣受重視之敘事取向為例，改視大眾傳播為「在某些特定時空情境、透過中介人造物件並常藉由大眾媒介管道述說故事的歷程」，其內容涉及講述者之自述／他述生命故事，旨在抒發情感、激發想像、促進彼此傾聽以建立社區感，進而體驗人生、瞭解生命意義、創造美好生活，與傳統實證主義效果論之思維顯有不同。

關鍵詞：大眾傳播、後設理論、敘事、敘事傳播

* 本文改寫自國科會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2009.08.01-2010.07.31）「傳播與敘事：以『生命故事』為核心的理論重構」（98-2410-H-004-108-）結案報告，曾於第九屆中國跨文化交際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福建省福州市，2011年6月22-26日），部分修改內容亦曾於2012年夏在南京市南京大學「媒介文化與國際傳播」國際學術論壇報告（2012.07.04）。作者感謝政大傳播學院「老人傳播研究群」成員在研究期間之協助，亦蒙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等教授建議，兩位匿名評審及《中華傳播學刊》編委會提供意見對本文修改極有助益，專此致謝。

** 臧國仁為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kjt1026@nccu.edu.tw；蔡琰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故事威力無窮，這正是為何政府、企業、利益團體無不雇用大批人員以創造「正確故事」並改變其他故事（或我們對其他故事認知）之主因。……文學或敘事寫作手法不應僅被視為作假而不屑一顧，如其能被正確使用，當是讓故事為真的重要工具。（Bird & Dardenne, 2010: 214）

壹、前言

2010年盛夏，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報紙組（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s Newspaper Division）召集人 Cassidy 教授呼籲會員們針對該組應否／如何更名提供意見（見 http://aejmc.net/pipermail/news-list_aejmc.net/2010-July/000207.html），短短五天內吸引了五十餘篇電郵信件共同針對「報紙」這個媒體還能維持多久以及傳播研究者（尤其新聞與報業研究者）如何持續進行相關研究交換觀點，其中當然也包含了有關新聞／大眾傳播教育未來走向的意見抒發。

大體觀之，類似討論多少反映了美國大眾傳播學界（上述信件部分來自非美籍學者）近來廣受科技影響所感受之不安與困惑，^[1]但要讓「報紙組」之名改弦易張短期內恐不易有任何具體結果（如美國喬治亞大學退休教授 Eberhard 即稱「要改名實嫌太早」），乃因多數人常如「溫水煮青蛙」般地無意進行急遽式調整，^[2]直到危機已到眼前方願啟動機制，此乃人之常情。^[3]

實際上，大眾傳播領域面臨此類「更名」之學門自省並非始自今日，早在一九五零年代 Berelson（1959）與 Schramm 間之辯論即已揭示「就傳播研究而言，其正凋零中」（withering away）。^[4]而時為美國 Stanford 大學博士生之 Peters（1986）亦曾撰文指稱傳播領域（其意亦指大眾傳播領域）早已創意枯竭，定義與涵蓋範圍雖然廣泛且與大部分社會科學領域重疊，但其無所不包特質卻反凸顯了領域「智識貧瘠」之本質，缺乏理論內涵深度；Peters 稱此現象為「學術的台灣——偏安小島卻號稱擁有全中國」（同上引：544）。

在該文中 Peters 曾經追溯美國傳播學門奠基者如 Schramm, Lazarsfeld, Lasswell, Hovland 之研究背景均與二次大戰或冷戰早期的「政策研究」或「情報需求」有關，如 Schramm 即曾服務於美國政府「戰爭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致其初期探究「大眾傳播」之旨多在解決實務問題（如宣傳效果之有無或強弱）而非如其他學門之鑽研知識（如政治學領域旨在增進民主制度內涵）並與日常生活（如促進社區成員間之互動）無關，研究者像是「僧侶般地聚合」（Peters, 1986: 546）自成一家，擅於計量研究方法並精於「操作」卻對成為「大理論家」不感興趣，長久下來整個領域已漸失學術活力。

Peters 之文如今二十餘年後讀來仍擲地有聲，其後也曾引起迴響（Gonzalez, 1988），如其業師 Chaffee 即曾提出「大眾傳播走到末路了嗎？」後續觀點（見該文標題），強調無論從社會發展、實務內涵或是學術領域觀之，「大眾傳播」均屬「二十世紀獨有現象」（Chaffee & Metzger, 2001: 365）。然而隨著新媒體崛起，此一「獨有」特性正已面臨挑戰，影響所及，傳統依附大眾傳播現象而廣受重視之諸多「理論」如議題設定、涵化理論、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顯都面臨重整／建，否則亦將產生「大眾傳播理論之窮途末路」（同上引：374），尤應力拒擅將大眾傳播舊有理論模式（同上引）逕行套用在新科技媒體的誘惑。^[5]

本文旨在延續 Peters 及其他研究者相繼提出的自省努力，認為學門發展半世紀以來疲態漸生，而前引學門奠基者慣從實證典範出發提倡「〔大眾〕傳播內容如資訊傳輸」（communication as transmission；McQuail & Windahl, 1981；簡稱「資訊觀」）理論模式業已導致研究者過於重視研究成果之效果、研究過程之重複性、研究對象心理作用之可操作性、研究發現之可驗證性，不僅如前述早已失去智識活力更也與傳播之主體「人」及「生活世界」（Schultz & Luckmann, 1980）無關。

為了導正上述偏廢，未來恐仍應慎思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前院長 Carey（1988）稍早發展的「文化」觀點，多視傳播為「分享」、「參與」、「連結」、「共同擁有」或「共用信念之再現」，包含「共同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社群」、「溝通」等彼此相互歸屬的概念（譯名出自徐國峰，2004：12），而此些概念也恰與敘事理論契合，值得引介（參見 Misher, 1984, 1986）。

有鑑於此，本文嘗試連結近二十年來延續「向詮釋學轉」（the interpretive turn；Rabinow & Sullivan, 1979）傳統而生之「向敘事學轉」（the narrative turn）（Czarniawska, 2004；Riessman, 1993：1-7）理論取徑建議大眾傳播領域除傳統「資訊觀」外亦應積極納入「敘事觀」，甚至不吝於「用散文體」（指人文取向）研究傳播（施進忠，2010），如視新聞報導內容為「生命故事」之述說與分享且新聞訪問為生命故事之對話交換過程（臧國仁、蔡琰，2012），進而結合大眾傳播與敘事為「敘事傳播」（narrative communication）以期活絡整個學門之內涵並強化後設理論之廣度與多樣性。

以下將先討論「敘事」，次則回顧與「敘事傳播」直接相關之四本敘事專著，接續述明大眾傳播研究如何得與敘事取徑連結藉以探索「人」及「日常生活」。

貳、簡述敘事學／理論／研究及其對大眾傳播研究之意義^[6]

「敘事學」（narratology）來源廣泛，一般多將其源起歸功於眾多結構主義批評家（如 Genette, Bal, Prince, Barthes）在 1960 年代前後的努力（Onega & Landa, 1996），從而奠定了敘事結構的諸多內涵與元素，如情節、事件、文本、故事、焦點、時序、敘事者與敘事對象、作者與讀者、調性等核心概念多在此一時期發展，豐富了敘事學／理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相關概念引自 Onega & Landa, 1996）。^[7]法國重要思想家 Barthes 1966 年在 *Communications* 期刊之特刊發表專文亦曾闡述敘事的無所不在（omnipresence）特性，反映了其跨領域本質（Barthes, 1966/1977；László, 2008: 10）。

而敘事學之發展自始即受文學理論家的深厚影響，其旨多在討論故事文本所展現的意義。其後語言學者常認為敘事具有「指示」作用（referential function），如 Labov & Waletzky（1967）之經典著作就多強調所謂敘事乃將過去經驗透過文字或符號展現，由敘事者依語言的序列作用而將原始事件的發展過程／歷程始末述說出來，「時序」因而常被視為敘事最重要的內涵（László, 2008: 10）。

八〇年代前後敘事論者受到詮釋學派（尤其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ism）影響轉而重視語言、符號、文化情境對「故事」與「論述」（discourse）的作用（Chatman, 1980；Gennette, 1980；Gergen & Gergen, 2003；Greimas, 1990），且將轉譯文本所需的媒介模式與管道（mode）一舉擴充至音樂、舞蹈、運動、博物館陳列物、體育活動、社會儀式、建築設計等（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舉凡任何能以某種敘說形式安排而再現原始事件之物件均可謂其具故事意涵（Randall & McKim, 2004: 7）。

自此敘事研究一躍成為多元且內涵豐富之學術範疇（Bal, 2004），專注於探究創作者、讀者、文本等基本元素及其間之互動深層意涵，尤視敘事分析為「呈現意義的過程與責任」，接近「後結構主義」說法（Josselson, 2007），常被視為對抗「笛卡爾理性〔實證〕典範」的重要行動（Brokmeier & Carbaugh, 2001: 9；添加語句出自本文），此乃奠基於敘事理論／研究／典範旨在研究「社會與文化過程……，以便其行動者的意見能被聽見，且個人的、情緒的、經驗的重要性置於非個人、理性、規則之上」（Georgakopoulou, 2007: 3），與社會科學傳統實證論一貫強調之「客觀」、「公正」、「理性」等信條顯有差異（潘慧玲，2003）。

但從學術思想流變觀之，不同思路／潮間之競爭本屬常態，如趙雅麗（2006）、Craig（1999）均曾討論「傳播理論七大傳統」（中文譯名出自趙雅麗，2006：3）藉此說明傳播領域曾經出現並引領相關研究的後設理論，但兩者均遺漏敘事學／理論／研究，亟待補充以能反映學門現有「眾聲喧嘩」現象（語出夏春祥，2006）。

跨越大眾傳播與敘事領域論著迄今數量有限，新聞領域已有何純（2006）、林東泰（2011）、曾慶香（2005）、蔡琰、臧國仁（1999）、Gurevitch & Kavoori（1994）、Jacobs（1996）、Johnson-Cartee（2005）、Liebes（1994）、Roeh（1989）等，廣告研究另有黃光玉（2006a，2006b），電影敘事研究則累積相關碩博士論文較早、較多。唯因受到1980年代前引「向敘事學轉」影響，雙方（大眾傳播與敘事）交會處已愈形明顯（Berger, 1997／姚媛譯，2002），值得繼續牽連。

如文化人類學家 Bird & Dardenne (1988, 1990) 早在 1980 年代末期即曾提出「新聞即故事」(news as story) 論點, 指陳傳播工作者(如新聞記者)之任務等同傳統「說故事者」(storytellers), 不斷以特定方式框架世界以傳遞閱聽眾所能接受的真實風貌, 「新聞／大眾傳播與敘事」的跨疆界思考模式自此次第啟動。

由此觀之, 從敘事典範入手檢視大眾傳播理論相關研究議題應非純是對現有主流傳播思想之一般性批判(見 Carey, 1988), 更涉及了由前述「資訊觀」往「敘事觀」轉向之嚴肅議題(Fisher, 1985), 倡議以不同後設理論面向(meta-theories)重新觀察社會與個人如何受到傳播內容影響, 進而探究大眾傳播內容(如新聞報導)之創作者、讀者、文本等基本元素如何互動並相互影響之深層意涵, 進一步視其為理解大眾社會日常生活並啟迪美好人生之重要途徑(見 Berger, 1997 / 姚媛譯, 2002; 臧國仁、蔡琰, 2005a)。

因而大眾傳播內容(如新聞報導)應非僅如實證典範所示之對應於外在世界的客觀真實, 而更係訊息創作者(如新聞工作者)從真實世界(社會情境)裡挑選並重組某些片段後之「再現」結果, 乃其認知思維(如記憶與經驗)運作後透過語言符號所建構之文本(如 Herman, 2009: 137-150 即曾討論 narrative and mind 以及 experiencing minds 概念), 而其核心則係「故事」, 可定義為「時空背景中由行為者〔敘事者〕所引發或經驗的行為動作」(Jacobs, 1996: 387-388; 添加語句出自本文)。另如 Randall & McKim (2008: 22-23) 引自神經科學之研究結果所稱, 認知思維裡天生即有故事基模: 「敘事活動乃出自意識(consciousness)的最基本形式, 且意識本也就是一種敘事過程」。

而在敘事典範字彙中, 人際溝通乃建立在「意義共享」基礎(符合上節所引 Carey 見解), 彼此以「好的故事」聯結(參見 Fisher, 1987), 而所謂「好的故事」當然涉及了不同時代社會文化對此「好」的定義, 因而敘事理論與美學及文化研究間的互動向來密切。此點對大眾傳播當亦有啟示作用, 即新聞內容報導不僅在反映真實社會之變動或災難事故之警示, 更也是諸多良善故事的共享, 而新聞記者亦可

能「如詩人般地『玩弄文字』，或是操縱裝飾語文，表達文化意涵並從中掌握或建構美感」（臧國仁、蔡琰，2001）。

由此亦可推知邏輯實證主義（logic positivism）理性取向與建構主義敘事觀點引入傳播領域後之可能差異：前者假設傳播者（如新聞工作者）可透過自我觀察而理性地「還原」（常稱「化約主義」reductivism 或「極簡主義」minimalism，參見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 蔡敏玲、餘曉雯譯，2003）社會行動或傳播行為之原貌並以文字符號語言「正確地」轉述，而受播者（如閱聽眾）同樣也能「還原」事件原委，社會真相（如新聞事件）經此多次還原後即可展現並可學習。敘事論者卻認為任何文本（即便新聞等非虛構成品）均屬「再現」或「建構」成品，前者（再現）之意在於將原事件以符號或文字再製，而後者（建構論之敘事觀點）則意味著個人透過主觀認識方能產生文本意義，皆與實證主義假設不同。

是故本文所擬之「大眾傳播敘事取向後設理論」提議似有其學術價值，乃因面對近來如網際網路（Internet）等新科技帶來之衝擊（如媒介與資訊管道多元且多樣），若仍持續以 20 世紀四、五〇年代資訊尚不充分時代（如前述大眾傳播奠基者所處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時期）發展之「真實」、「正確」、「中立」等傳統客觀信念並引其為 21 世紀大眾傳播（含新聞學）領域主要理論內涵，恐將陷入前引 Peters, Chaffee 等人所稱「難以為繼」窘境。

而網際網路發展至今不過數年，其影響寫作模式（如部落格書寫相較於傳統媒介寫作，見施力群，2005）、互動型態（個人化行銷相較於整合行銷機制，見戴皖文，2006）、作業流程（如公民記者相較於專業新聞行業，見黃惠萍，2005）至巨，未來恐難再以傳統大眾傳播理論線性靜態資訊模式解釋（此當即前述 Chaffee 所稱不應套用舊有理論模式於新科技媒體之因）。其影響所及亦已使主流實證典範理性模式遭逢重大挑戰，此刻開始研擬不同理論取向（趙雅麗，2006，2010；Craig, 1999）以豐富學術領域之多元、多樣內涵進而帶領研究與教學內容改頭換面，當有迫切需求。

參、「大眾傳播」與「敘事」之可能構連——以四本專著為例

如上節所述，二十世紀中葉拓展的大眾傳播領域與敘事理論原屬兩個無甚相干的學術範疇，本體論與認識論等後設理論大異其趣而過去鮮有往來。簡單來說，前者起自如前述 W. Schramm 等奠基者而一向以探索「傳播過程」之相關變項為其核心意旨，延續其時業已盛極一時之社會科學實證論（positivism）系統結構與功能取徑而強調媒介組織的社會影響力（參見李金銓，1988）。而敘事理論／研究／典範有其語藝行為（rhetorical behavior）特色，早在希臘時期即已開始討論如何透過故事以能達成說服目的，深具藝術本質與人文特色（林靜伶，2000：93-106），兩者（大眾傳播研究與敘事研究）重疊處有限。

但近年來雙方互動漸勤，領域界線亦漸趨模糊，直接相關者多在電影敘事研究（Bordwell, 1987／李顯立、吳佳琪、游惠貞譯，1999）、戲劇傳播（蔡琰，2000）、文學傳播（文言，2006；Coste, 1989）等，彼此內涵相近（見下說明）值得牽連並建立互動軌跡。此處且試援引四本傳播專著藉以說明「〔大眾〕傳播」與「敘事」間過去曾經如何相互關聯以期下節逐步建立「敘事傳播」之本體論與認識論，四書依序是：Fisher（1987）、Cragan & Shields（1995）、胡紹嘉（2008）、Berger（1997／姚媛譯，2002），次節接續討論大眾傳播與敘事研究如何可能連結。^[8]

嚴格來說，此四書皆屬敘事傳播早期奠基之作，內容反映了「〔大眾〕傳播」與「敘事」構連時所應發展之後設理論思路。如 Littlejohn（1999：31）之闡述，「後設理論」之意在於「針對事物本質而超越任何特定理論之思辨」，常出自對某一知識領域之不確定樣貌之諸項爭辯，包括「如何觀察」、「觀察何物」、「觀察之理論根據為何」等條件，可歸納為「知識論」（epistemology）、「本體論」（ontology）、「價值論」（axiology）、「方法論」（methodology）等。

潘慧玲（2003：116）則認為不同思想或主義間之後設理論爭辯本屬學術常態，如傳統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一向：

秉持著「客觀」的立場進行研究，對於自己如何看待社會實體（reality）、如何定位知識、以及自己與被研究者之應維持何種關係等問題，並不假思索，許多習以為常的定律被視為理所當然。

此舉因而引發後續研究者將「原本不需討論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等議題，挑出來檢視、反思」進而形成「社會科學研究典範之改變，由過去獨尊實證主義而至今日多元典範併陳」。

而在傳播與大眾傳播領域，由傳統實證主義「資訊觀」轉向「敘事觀」之建議（如本文所示）似正呼應了上述 Peters 與潘慧玲等所見，可視為不同後設理論取徑與世界觀之爭辯。事實上，本文擇取以下四書係著眼於其各自所能連結敘事與傳播（含大眾傳播）之不同面向。

三本英文專著分別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至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出版，約可代表了該十年間（1985-1995）傳播研究者之反思與觀點調整（隱然與前述 Peters 之論的時間點契合）。如 Fisher（1987）致力於指陳敘事典範與理性典範之異同，其作品完整地呈現了「敘事傳播論」之可能理論內涵並也在傳播研究領域點燃對主流典範實證主義後設思路之挑戰。Cragan & Shields（1995）則延續其觀點兼採 Bormann 與 Burke 之符號學理論，試圖填補「應用傳播學」（applied communication theories）理論不足現象；Berger（1997／姚媛譯，2002）另闢蹊徑，專事討論敘事理論如何得與「日常生活」連結。而胡紹嘉（2008）近作則為首本結合個人生命故事（教師授課知識）與敘事課程之中文著作，關注對象正可延伸前述三本英文專著並接續下節有關生命故事作為敘事核心意旨之討論。

綜合觀之，三本英文專著均從廣義角度（尤其人類傳播）說明敘事取徑之可能後設理論本質，除各成一家之言外相互間兼有構連，但僅有 Berger 論著涉及大眾傳播，其內容雖嫌淺薄但仍可視為從傳播領域過渡至大眾傳播次領域之重要橋樑。胡紹嘉著作未曾區分人際與大眾傳播，但所述涉及更深層之傳播「自我生命意涵」與「存在價值認同」且與近十餘年來崛起之「敘事心理學」接軌（詳見 Fivush & Haden, 2003；Sarbin, 1986），對所有大眾傳播研究之敘事轉向均當有重大啟示作用（參見臧國仁、蔡琰，2011 類似觀點）。

一、Fisher 之「人類傳播即敘事」觀點

根據 Littlejohn (1999: 169)，傳播領域之最完整敘事理論整理非 Walter Fisher 莫屬，乃因其篤信人類理性之所有形式都奠基於敘事，而所有傳播形式也都可透過敘事理解。若以 Littlejohn 專書在傳播理論之重要地位觀之，如此美言當能反映 Fisher 專書對敘事傳播理論發展與奠基之可能貢獻。

首先，Fisher 之學術背景係在「修辭學」(rhetoric，亦譯「語藝」)，因而假設人類不但理性且具修辭天性。但自希臘先哲蘇格拉底以降之理性典範習以認為某些特定論述類型(如科學或哲學論述)較近真實，擁有崇高地位也較具溝通價值；相較於此，日常論述(如詩作 poetry)則因缺乏專家觀點(expert opinion)而無智慧作用，導致一般研究與生活世界脫離。同理，修辭論辯(argumentation)傳統上因自有一些前提(premises)與規則而被認為較具理性，故事則否。

Fisher 引述眾多文獻挑戰這些論點，認為上述說法無助於解釋論述如何產出。雖然各方均曾努力改善此類「偏見」，如結構主義提倡「形式」主宰意義交流、邏輯實證主義認為「可驗證內容」方屬意義所在、文學批評理論及社會科學強調「文本」決定意義，但「傳播無政府狀態」(communicative anarchy)仍舊凸顯了理性典範過於篤信「語言不證自明」(接近前述「語言即真實」或「語言可反映真實」之語言轉向內涵)卻忽略其複雜性，值得深究。

Fisher 特別強調「敘事典範亦屬理性、價值與行動之哲學」(Fisher, 1987: 47)，且敘事理性有其邏輯，而此理性乃透過故事之「敘事可能性」(narrative probability)與「敘事忠實性」(narrative fidelity)區辨(譯名出自林靜伶，2000: 97)，前者指「將故事內部之結構、素材、人物完整串連的程度」；如人物動機「決定了〔故事〕是否可信，而可信則是〔閱讀者〕信任的基礎所在」(Fisher, 1987: 47；增添語句出自本文)。

至於「忠實性」則與「好的說服理由邏輯」有關，指故事與真實經驗相符程度，尤指故事講述物件認同其所傳達的價值觀念或與日常生活相符的程度。Fisher 認為任何故事必須同時反映邏輯理性與價值理

性，不合邏輯理性的故事猶可因其符合價值理性而被接受，但若兩者都不相符則必遭摒棄。

在該書第二部分，Fisher 呼籲重省「理性訴求」(logos；譯名出自林靜伶，2000：23)一詞之古典意涵，改視「敘事」為人類溝通情境所在，也是知識傳遞主要管道：「我們詮釋生活與文學於故事，而這些故事又包含於其他歷史、文化、人物故事裡，從而產生〔人類的〕爭鬥與對抗」(Fisher, 1987: 193；增添語句出自本文)。Fisher 認為，敘事無所不在，乃因人們天生即具敘事理性(narrative rationality)，但也受制於敘(故)事所揭露之情感與觀念。

Fisher 接著提出其核心觀點：人除是理性動物更是敘事動物(homo narrans)，決策與溝通不盡然立基於理性之對錯論辯，反是為了找到「好的說服理由」(good reasons)，可透過不同形式之「詳述」達成，藉此詮釋具有正面價值的生活意義。舉例來說，如要邀請旁人參加「保護動物協會」的遊行活動，通常可以「動物也是生物有其動物權」等理由勸服，但也可能因為這種講法過於理性而無法為某些人士所能接受。此時若能找到可愛動物的相關故事(如老年人或殘障人士常倚賴動／寵物協助日常生活)，「溝通效果」可能遠比理性論辯來得好(此例出自 Littlejohn, 1999: 169)。

在結論一章(題名：回顧〔In retrospect〕)，Fisher 特別指出其書特色在於重新喚起對前述「理性訴求」意涵之重視藉此以嶄新方向理解何謂「人類傳播」。其次，其書亦在指出「敘事乃解釋或評估所有傳播之情境」(Fisher, 1987: 193)，人們總是透過故事理解日常生活且這些故事也鑲嵌於其他較大故事類型如歷史、文化故事。因而敘事在人類言說中無所不在(omnipresent)，但其並非只是「虛構小說」也不提供類似論辯形式的直接說理，反以間接、隱晦且讓聽者不自覺的方式講述故事。最後，Fisher 強調人類生活中的確存有「敘事理性」，無時無刻地在溝通互動中促進人際理解。

此外，Fisher 亦曾提及其「敘事典範」提議受到其他研究者如修辭學者 Bormann 與 Burke 啟發甚深(同上引：63)：「……如 Burke 所稱，生活乃故事，此些故事並也成為其他已活過、正在生活、即將生活者的故事之部份」。顯然其關心處貼近日常生活而與實證主義強調之客

觀世界有異，深受 Schultz & Luckmann (1980) 之「生活世界」觀點影響，強調所有意會與詮釋均需透過不斷地協商方能產生意義。

綜合觀之，Fisher 的敘事溝通觀點可濃縮為以下五點 (Fisher, 1987: xi, 64-65)：

- (1) 人的本質生而能說故事；
- (2) 人類的傳播基本形式就是故事，指「透過歷史、文化、人物角色以及時間所形塑的符號詮釋」；
- (3) 所有論述形式皆旨在構成「好的理由」，指「能讓人相信或行動的價值保證」；
- (4) 人的理性乃敘事理性，由故事的可能性與忠實性決定；
- (5) 我們所理解的世界皆出自一連串故事，乃透過持續創造／再建過程 (continual re-creation) 並篩選部分情節而來 (四與五項出自 Fisher, 1987: 64-65)。

二、Cragan & Shields 之延伸論點

但 Fisher 專書猶未詳述敘事典範與其他相關理論之關係，此點成為 Cragan & Shields (1995) 討論核心所在。該書首版成書於 1981 年，旨在轉錄 Bormann 之傳播理論於應用研究，其後因 Bormann 命其理論名為「符號聚合理論」(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且 Burke 「戲劇理論」(dramatism theory) 與 Fisher 前述敘事理論次第成形，Cragan & Shields 進而合併三者以期建構「應用傳播研究之〔後設〕符號理論」(symbolic theories in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簡稱 ACR Metatheory)，藉此彰顯「應用傳播研究」之理論價值並強調其非僅具技術內涵。

兩位作者在該書第四章詳述 Fisher 理論並稱其為「敘事典範理論」(narrative paradigm theory)，可歸納為下述五個預設 (Cragan & Shields 整理自 Fisher 多篇論文但與前述假設略有差異)：

- (1) 人是說故事者 (主體論)，乃因 Fisher 認為「所有論述皆敘事」(Cragan & Shields: 95)；

- (2) 所有形式的人類傳播皆為故事，即「無論發生時間為何，世事皆可以符號詮釋並形塑為歷史、文化、人物角色」（價值論），且一旦使用敘事典範，則無論聖經或經濟學講義皆亦當皆可視為具有故事形式，此乃「價值論」之抉擇（同上引）；
- (3) 人類以「好故事」為其信仰或行動準則（本體論）。兩位作者指出，Fisher 認為「理性推理」（rational reasoning）無法解釋人類如何接受真理、知識、真實而應加入「良好理性」，此乃敘事典範之本體內涵；
- (4) 人皆天生擁有敘事理性得以評估人類溝通（本體論），乃因 Fisher 相信評斷故事真假之能力出自天賦，屬「實用智慧」；
- (5) 在持續創造過程中，人們選擇不同生命片段以完成不同故事，從而締造了〔文本〕真實（認識論）。不同形式之敘述彼此競爭，故事間也相互嵌入情節，環環相扣之餘任何故事總能追溯到其背後「大故事」（grand story）之價值觀。

Cragan & Shields 發現，1973-1992 年廿年間共可搜尋到 31 篇相關傳播與敘事論著（包括引用該理論或自稱「說故事者」研究），分屬政治傳播、組織傳播、論辯、人際／小團體傳播、大眾傳播等次領域，顯示了敘事與傳播領域間的重疊性，而這些文獻也曾批評 Fisher 理論之缺失（同上引：261-265），如「並未提出新的知識」、「尚非全面性理論」（general theory）、「敘事理性非具普遍性」、「輕視理性之重要性」等，足可反映敘事傳播間之理論建構討論肇始不久，有待持續演進。

根據 Cragan & Shields（同上引：263），Fisher 回應時曾進一步寬列敘事意義為：敘事₁，指一般人之故事述說；敘事₂，指特定論述範疇（如就職演說）、敘事₃，指理解人類所有論述的概念架構。由此較新說明可知，Fisher 的敘事傳播論非僅適用於一般人的故事（指敘事₁層次）或某些特定論述內容（指敘事₂），更也具有理念架構（敘事₃）可用以解釋不同情境（如大眾傳播內容），似已略具規模。

合併觀之，以上二書有其一脈相傳之核心主旨，即視修辭為敘事理論／研究／典範之源起，因而出現共同缺憾。舉例來說，Fisher（1985）關注之處多在傳播哲學與理論層面，「並未具體規劃任何分

析架構與方法」(林靜伶, 2000: 100); 此點或可歸咎於其撰書之旨本在筆路藍縷另闢蹊徑, 需就敘事溝通之後設理論層次詳加檢討而難顧及實際架構及方法層次。至於 Cragan & Shields (1995) 則因延續 Fisher (及 Bormann 與 Burke) 而能納入眾多後續批評(見第八章), 但在研究步驟上是否/如何妥善處理其「應用性」則仍未見討論, 尤以敘事與「外在情境」之關連如何對傳播文本有所影響似是主要缺失(林靜伶, 2000: 103)。

三、胡紹嘉之敘事與個人述說觀點

相較於前引兩本英文專著之焦點常在故事文本如何與社會情境牽連, 胡紹嘉(2008)關注層面似更貼近敘事與個人間的互動。在其「緒論」一章首節即曾追憶研究生時期(1994-2002)正逢國內傳播學門之「研究典範」與「理論趨向」爭辯最為劇烈之時(同上引: 1; 參見本文註1), 也使其不斷面臨在「強調理論的客觀、普遍與可操作性」(即前述實證典範)與「著重對人之溝通與行動的哲學思考及意義理解」(即前述敘事典範)間掙扎而難以抉擇(同上引)。

胡氏自承其後選擇敘事論之因在於「傳播活動不能脫離社會情境而存在, 而社會知識的傳承又必須藉由表述活動才得以延續」(同上引: 2), 此處之「社會情境」一說彌補了前述 Fisher 不足之處, 也與前引「生活世界」連結, 顯示其「蘊含著難以化約、豐富和多重的『真實』(reality)」(同上引, 括弧出自原書)。至於「傳播理論」, 胡氏因而強調就當是各種對人際互動與溝通之探索而非如量化研究素來專注之標準與效果。

延續此一撰寫脈絡, 胡書亦就「敘事」、「自我」與「認同」三者進行系列討論, 因而認為個人自我認同的基本途徑就是「說故事的過程」、「對於故事的認知或重構」、「敘說的內容和結果」, 分別涉及了故事情節的安排與說故事者如何認知並重整故事的歷程。

由此, 胡氏述明「自我」乃「為故事所特徵化的行動者」(同上引: 10), 亦是「行動者(任何敘事者)透過敘事等語言表述活動所建構」(同上引: 9), 透過「認同」方能體認自己與他人間的不同與共同。

而該書之分析物件則從自傳作品到課程實踐皆有，藉由不同研究設計（如訪談、參與觀察、小團體討論）系統性地搜集生命故事，結合了個人敘事與生活經驗的分享。

在結論章節，胡氏分依敘事與歷史文化間的關係以及敘事者之個人經驗如何在述說中建立與他人關係進行檢討，認為「說故事」與「說自己的故事」乃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範疇（簡稱「自述」與「他述」，見下節討論）：說自己故事者（如其授課學生）經由持續溝通過程後常能藉由對自己際遇與生活的回顧與敘述而重整生命經驗、聯繫自我及他人的關係，進而尋求他人認同。因此胡氏認為，「我們……必須正視他人的生活世界與生命歷史，減少冷漠或譏諷，彼此仔細認真地傾聽對方的故事，把對方看成一個獨特的、有欲望需求的個體……」（同上引：277），因而擴大了敘事與他人及人際互動的關連。

與前引二書（Cragan & Shields, 1995；Fisher, 1987）相較，胡書顯因其出版時間較晚而納入了與傳統敘事領域修辭論點不同但又接近最新研究趨勢之概念如自我、認同、記憶，尤以其所強調之「自傳式觀點」（*autobiographic perspective*，見胡紹嘉，2008：111）對本文下節所欲發展之敘事傳播後設理論思路最具啟發性。

根據胡氏，敘事不僅是早期研究者所一貫強調之「文本」，更也是「〔溝通〕行動者透過敘事等語言表述活動所建構的自我」，而自我則是「為故事所特徵化的〔溝通〕行動者」（同上引：9-10；添加語句出自本文）。由此觀之，任何溝通行為不復如傳統資訊觀所示乃訊息傳輸過程而係任何溝通者自我表述、建構完整生命故事的歷程，進而得與以透過這些表述而與他人建立互動關係；敘事因而不僅是故事表述，亦是自我生命故事之表述，更也是與他人建立互動關係的表述，此些觀點顯已與敘事領域近期強調之「向自傳式方法轉」（*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Gorra, 1995）、「向關係轉」（*the relational turn*；Josselson, Lieblich, & McAdams, 2007）等學術新貌契合。

四、Berger 之日常生活敘事傳播觀點

相較上述三書，Berger 專書之理論意涵並不深入，僅在前三章略述「敘事的本質」、「敘事理論家」、「敘事技巧與作者的手法」等（譯

名均出自 Berger, 1997 / 姚媛譯, 2002)。但 Berger 確是近代推動敘事理論於日常生活最力之傳播研究者，乃因認為敘事（故事）在「我們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同上引：10），早自父母親教唱搖籃曲或背誦童謠或讀童話故事，及長後開始作夢、講笑話、交談、寫信、寫日誌，無一不與敘事有關，顯示「我們〔每日皆〕沉浸在敘事之中」（同上引：1）；我們不但習於接受故事，也是故事的創作者。

而 Berger 更強調大眾媒體在現代生活中之敘事作用，全書十二個章節竟有六個與廣義之大眾傳媒載具有關，包括「童話」、「連環漫畫」、「電視廣告」（電視敘事）、「通俗文化小說」、「電影」、「廣播」（但新聞成品則未納入），足可見其所說之「日常生活」實與「大眾傳播生活」相近。而透過其所述之敘事與傳媒日常生活亦可理解傳播研究亟應視媒介內容為廣義敘事，由此探討其與傳播者／接收者間之互動與延展性。

Berger 認為，大眾傳媒內容或由個人或由集體創作，乃係針對閱聽眾所需而撰並通過某種媒介傳達，包含五個重要元素（或稱焦點）：藝術作品（文本）、藝術家（創作者）、媒介、社會、觀眾（譯名均出自 Berger, 1997 / 姚媛譯, 2002：17）。此五者相互關連也能產生不同組合，使得許多過去未被視為敘事的素材作品（如對話、病痛講述、戀愛、心理療法、笑話等）也都頗具敘事特色。而透過大眾傳媒展示的敘事類型則更不勝枚舉，從而形成了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主體，乃典型每日活動內容。

但 Berger 也曾述明敘事又非等同日常生活，乃因後者「是真實的，可以說是我們生活中的東西，……或多或少自動地發展，直到我們死去。我們可以在生活中時時看到順序和敘事因素，但是這和說他們是敘事不是一回事」（同上引：179）。Berger 強調，敘事是「虛構的」、「閉合的」、「有開頭、中間、結尾」、「其間糾葛在結尾裡〔常〕得到了解決」（同上引：180；添加語句出自本文），也比日常生活「集中」，多在談論他人的衝突、問題、威脅等複雜情事，但日常生活卻常相對平凡、平淡。故事內容各不相同，但真實生活內涵則不斷重演（早餐、工作、吃飯、睡覺）；相形之下，故事主角的「日常生活」常緊張刺激、高潮迭起。總之，故事多模仿日常生活卻非日常生活，此點也是媒介內容最易引發爭議之處——其屬日常生活之再現，內容卻非日常生活。

總之，Berger 此書文筆流暢，涵蓋之類別面向遠逾前引三書，尤以其筆調輕鬆兼有眾多手繪圖畫旨在「提供更多視覺興趣」（同上引：viii），足可反映敘事溝通之日常敘事特色（此點與前述理性典範認為某些特定類型擁有崇高地位之說法迥異）。

換言之，Berger 此書與傳統敘事學／理論／研究所示不同，旨在反映敘事無所不在（*narratives pervade our lives*；同上引：9）且其內涵與日常生活緊密連結，結構雖嫌鬆散卻別具吸引力，看似平淡實則寓意頗深；簡而言之，敘事符合人性、具有藝術內涵、常能促成情感互動。此點恰可彌補前述傳統資訊觀常被詬病之「失去智識活力」缺失，重新從「生活」與「人文」（藝術）角度構連傳播與敘事領域，進而活絡整個學門。

五、小結

以上四書分從理論、應用理論、日常生活、自我與認同層面延伸並發展敘事理論，合併觀之可謂共同組建了敘事傳播的基本內涵，描繪圖像則涵蓋了從個人到文本進而延伸至大眾媒體。然而綜合四書內容即可發現，敘事與傳播的確曾經相互融沁又分離各成專業，今日再度結合為「敘事傳播」實有長遠淵源。

舉例來說，科技與文明之進展早已造成現今流行音樂、動漫、小說、電影、廣告、新聞、戲劇等大眾傳播現象之故事內容相似或一致，媒介景觀卻各有符號及語言、言說特色。透過 Fisher（1987）、Cragan & Shields（1995）對敘事的預設，以及胡紹嘉（2008）、Berger（1997／姚媛譯，2002）對故事、自我、傳播與日常生活的連結，本文提出以下敘事傳播主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及方法論藉此籲求新聞／大眾傳播領域重視故事傳統，進而瞭解論述之特色乃在以「表述」、「轉述」、「再現」等角度重構故事並以適合媒介特定語言符號傳播認知世界中之真實。

敘事傳播之理論提議由此可初步整理如下：

- (1) 延伸前述 Fisher（1987）與 Cragan & Shields（1995）論點，本文認為敘事是傳播活動（含大眾傳播）的核心，包含如何說（論

- 述)與說什麼(故事內容)兩者,而故事是不同傳播者(如故事「講述者」及其「講述對象」)互動的核心內容(主體論);
- (2) 延伸 Berger (1997 / 姚媛譯, 2002)、胡紹嘉(2008)觀點,本文強調故事來自大眾傳播內容講述者「個人生命記憶」(如新聞報導之消息來源)的情感訴求(narrative self),不但展現個人智慧也在故事講述中建立身份認同(胡紹嘉, 2008)並與社會連結。Nelson(2003)稱此「文化自我」(cultural self),從小多從父母親的故事講述而與外在世界聯繫,因而也是眾人(如社會閱聽眾)集體記憶的建構或再現(認識論);
 - (3) 延伸前述 Cragan & Shields(1995)說法,個人故事不斷演變(此即故事的發展性或 developmental),從年幼到老年之內涵不盡相同,包含真實自我、理想自我、社會形象自我(此三名詞出自 Birren & Birren, 1996; 認識論);
 - (4) 延伸 Randall & McKim(2008)(見下節),面對相同生命經歷之記憶,個人講述故事時仍因受到「敘事環境」(narrative environment; 參見 Parsons, 2009)影響而擷取不同片段組成不同情節,因而總是自我生命的再述或再現(方法論);
 - (5) 延伸 Kenyon(1996)(見下節),敘事是展現「存在感」的重要途徑,透過持續建構與再建構過程從而達成反思性的實在(reality; 價值論);
 - (6) 延伸前述 Berger(1997 / 姚媛譯, 2002)所言,大眾傳播內涵雖仍與個人之敘事自我有關,但論述方式不同且較複雜,涉及眾多講述者(如新聞內容即可能包含多個消息來源之發言),多模仿自日常生活卻與日常生活不盡一致,而其內容常受機構常規限制(如新聞機構之講述方式與電視戲劇節目顯有不同),可稱之為「機構性敘事」特殊類型(方法論)。

肆、敘事傳播論之可能內涵

上節業已略述了與敘事傳播內涵相近之四本中外專書,兼及其所觸及之基本理論原則。若依此推知,敘事概念涵蓋範疇非如早期定義

之簡單形式，亦非徒具語言或修辭結構，實則與人類傳播（尤其大眾傳播）活動息息相關，包括從個人日常生活之基本活動而至人際互動或社會關係之建立均屬故事講述，或可謂其人類最重要之溝通活動當不為過。正如 Randall & McKim (2008: 7) 所示，「由於我們無法直接經驗〔真實〕世界，只能透過不斷編織眾多故事始得與日常存有整合」（integrated to our day-to-day existence；括號內文字出自本文）。

因而本文將依前節改視大眾傳播為「在某些特定時空情境、透過中介人造物件並常藉由大眾媒介管道述說故事的歷程」，其內容涉及講述者之自述／他述生命故事（見圖 1 內圈），旨在抒發情感、激發想像、促進彼此傾聽以建立社區感，進而體驗人生、瞭解生命意義、創造美好生活，與傳統實證主義效果論之思維顯有不同。

首先，此一說法足以顯示前節所欲反映之敘事傳播核心內涵即「敘事」，亦即生命故事之講述，指自我生命故事之講述（自述；見圖 1 第二層）。一般而言，任何故事之講述內容皆可謂之以自述為主，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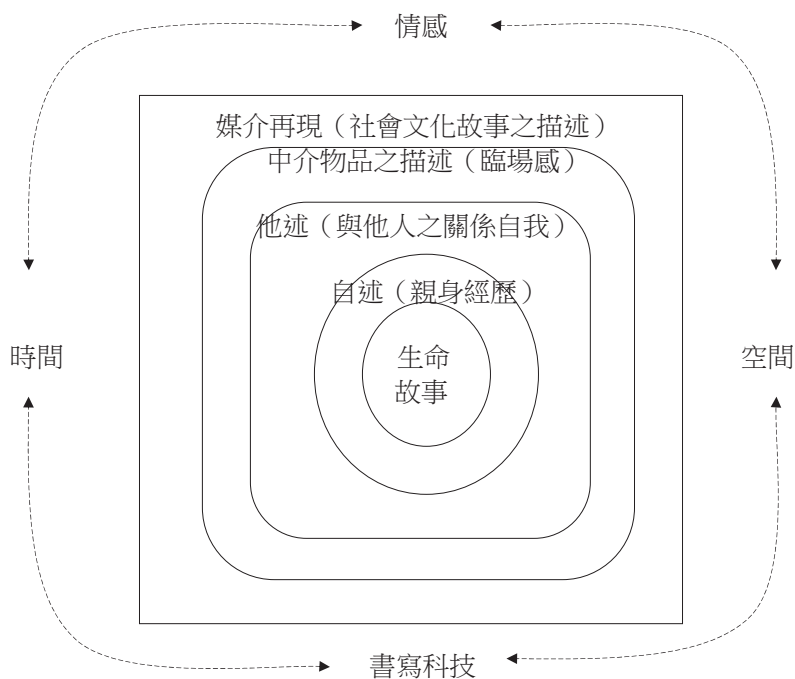


圖 1：「敘事傳播」主要元素之初擬

常生活無法離開自己對外在事物的觀感表達、從記憶中抽取之經驗述說、對「自我存在」(being for itself)之描述；此即敘事理論強調之「觀念自我」(conceptual self)起始所在(Bruner, 1990)，有其「存在主義」內涵(Kenyon, 1996: 22-23)。

然而任何自述內容均涉及個人親身經驗，常含自我(身份)、他人(人際關係)、社會(時空背景)而非「內心獨白」；K. Gergen(1999)因而稱此類與他人相關之敘事為「關係自我」(relational self；見圖1第三層)。Basso(1996)與Johnstone(1991)也常關心故事如何引發個人(回憶)與社會間的辯證關係，因而發現個人身份與社會關係皆可同時在敘事過程中建構出來：「故事在何處出現，就顯示出他們〔說故事者〕是誰」(添加語句出自本文)。換言之，任何故事均需透過某些敘事時空始能完成述說，此即Plummer(1995)所稱「故事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tories)之意(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 12-13)。

Josselson et al.(2007)因而改以「共有」或「共用」(communion)角度解析自我敘事(參見上節所引Carey, 1988 傳播文化觀點)，認為如何在人生故事自述裡適當地呈現(或遺忘)他人(此即他述，指講述故事時也涉及與他人之關係，仍見圖1第三層)皆屬重要研究素材，原因即在「從生命之初至一生，關係對自我之建構與陳述皆屬核心，……〔而〕要精準地從科學性語言瞭解人際關係實是極大挑戰」(Josselson et al., 2007: 3-5；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其次，敘事傳播理論除涉及「自述」與「他述」外，亦如前述猶需透過「中介媒介系統」(intermediate system；見圖1第四層)將其指稱之實體世界再現或建構至文本之內；此點相關討論甚多(參見Berger & Luckmann, 1966；Hall, 1997；Schultz & Luckmann, 1980)。荷蘭學者van Dijck(2004)近作則認為人之記憶不僅是腦中活動，也多受到社會文化影響，透過一些人造物品始能建立記憶並經常喚起這些記憶，此些人造物品即可稱為「中介記憶」，其意類似。

因而敘事傳播之內涵常超越「自述」或「他述」涉及之個人生命以及與他人之關係，並也觸及一些人造物品如相片、新聞報導、書報等或如紀念碑、博物館甚至公共儀式等中介傳播對象(蔡琰、臧國仁，2007：19)，而這些物件常是述說故事「此刻」對「當年」生命經歷

的記憶重構。記憶無法憑空展現，總需透過某些傳播物件之「記錄」或轉介（如轉喻）始能「喚起」，生命故事之述說因而總與這些中介描述有關；此點在「社會臨場感理論」（social presence theory）已多有觸及（見 Short, Williams, & Christie, 1976；仍見圖 1 第四層）。^[9]

最後，大眾媒介內容亦當與敘事相關，在前引 Berger（1997 / 姚媛譯，2002）中已有引述，乃因其深刻認為大眾傳媒（無論形式為何）所述皆有故事特質，不但取材來自日常生活，且其展現內容（如新聞報導、廣告、電視節目）更為典型生活話題。即便 Berger 強調敘事之複雜性可能超越日常生活之尋常性，但無可否認地媒介敘事內容均在轉述、再述、建構、再構一般人之生命故事，而社會大眾亦常透過此類生命故事而體驗人生，尋求智慧與情感依附。

此外，個人敘述當然也涉及時空因素（即 Herman, 2009 之「情境」；見圖 1 外層虛線並參見前述敘事之「時序」角色），包括對「此時此地」、「彼時彼地」、「他時他地」之講述，臧國仁、蔡琰（2005b）曾分稱其為敘事₁、敘事₂、敘事₃，藉以說明不同情境之話語再現皆只能反映部分真實（可比較前引 Fisher 之敘事₁、敘事₂、敘事₃）。而其述說方式也多倚賴當代盛行之書寫科技載具，如 21 世紀至今即已由傳統日誌書寫轉為部落格、Plurk、Twitter、Facebook，以致書寫形式亦從過去之線性進而成為多媒體超連結，形成類似吳筱玫（2003）所稱之「敘事池」，即其講述生命故事的情感參與廣度與厚度顯已與前大異其趣：

作者（如部落格主）不再一定是說故事者，讀者也不是被動地接收，敘事流程變成中間一塊廣大的敘事池，作者與讀者不是一來一往，而是幾近於同時地不斷把敘事元件，往池中丟，再各取所進行文本詮釋與建構。（同上引：193）

小結本節，本文援引相關文獻發現敘事傳播內涵當可視為生命經驗之「自傳式故事敘述」（Maynes, Pierce, & Laslett, 2008），包括從個人記憶裡篩選之生活經歷、與他人之互動、特定時空下的社會文化脈動中介紀錄（如新聞報導）。又因任何述說總不免涉及個人如何面

對情境選用適當言說語詞表達 (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而其所選勢將影響故事是否以及如何延續，因而述說者常能展現講話時之社會智能 (臧國仁、鍾蔚文與楊怡珊，2001)、情感呈現 (Schroots & Birren, 2002) 與美學想像 (如思考「新聞如何才能寫得美」，見臧國仁、蔡琰，2001)。其與傳統資訊觀傳播後設理論間之差異可參見表 1。

表 1：資訊觀與敘事觀之傳播後設理論比較

	資訊觀	敘事觀
傳播目的	傳播效果之達成	故事意義之分享
主體論 (核心概念)	資訊 (information) 傳遞	生命故事之交換
知識論 (學術範疇)	二元論與化約主義：傳播訊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乃分離實體，透過回饋作用方能互動，彼此經由一連串之還原過程探知社會真相	互動論與相對主義：傳播訊息發送者與接收者相互涉入主觀意識，價值觀彼此影響，傳播內容 (文本) 均係符號與語言再現與建構之成品
方法論 (探索方式)	實驗法與可操作性：傳播過程之資訊皆具可重複、可驗證、可操作等特質	詮釋法與辯證性：強調任何傳播者講述之故事僅具文本之「似真性」與「連貫性」
主要理論背景	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	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美學、社會互動論
價值論	傳播乃線性過程	傳播乃故事交換
主要理論背景	實證論	詮釋主義之社會建構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 (部分內容參考〈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潘慧玲，2003，《教育研究資訊》，11：115-143)。

伍、討論與結論——從傳統「資訊觀」到「敘事觀」的體悟與建議

有感於 21 世紀初大眾傳播領域受到新興科技影響甚深，其核心理論與典範業已難以解釋持續變動中之社會情境，不但實務工作者與教育者惶惶終日 (如前述報紙組是否更名)，大眾傳播研究如何面對時光遞嬗的世局亦早已是眾多有心者念茲在茲力求突破的心意。本文延續此類討論，試圖改從近年來廣受社會科學各領域重視之「敘事典範」入手重新定義傳播，藉此尋找新的定位與內涵以期建立與前不同之理論原則。

本文基本立場在於，西方（尤以美國）傳播研究傳統起自一九五零年代末期（即二次大戰結束後）發展之「資訊觀」，延續了同一時期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興起之實證典範觀點，認為傳播仿如資訊輸送系統般地係由傳送者發送訊息而至接收者之線性過程，研究者格外重視此一傳輸過程是否順暢、是否有效、能否達成〔發送者之〕目的，卻無視於此一訊息輸送過程是否注入美感、產生互動、激發情感或甚至對接收者而言是否具有特殊生命意義，長期下來極為缺少對「人」及「人文」面向之反思，實為缺憾（臧國仁、蔡琰，2001）。

時至今日，此類研究方法之步驟雖堪稱嚴謹、主事者立場力主客觀、研究態度追求理性，長期下來卻因過於拘謹而致學門已如前述創意貧瘠、疲態漸生且與日常生活脫節，更與其他學門絕緣而自成一言之言，「視野狹隘，……無法繪策多變的媒介生態」（李天鐸，2010：167）。

釜底抽薪之道恐仍在引進其他理論以能重新喚起傳播研究之人文特質（如前述 Carey, 1988 之建議）與領域內涵（臧國仁、蔡琰，2005a）。敘事學／理論／研究起自文學領域，富有人文色彩（如常強調「人生如詩〔即敘事〕，詩如人生」的境界；Randall & McKim, 2004），早期受到結構主義啟發而常探索如何述說故事、故事結構為何、聽者如何解讀故事。較新取向則更專注於敘事之聲音（voice，指講故事的人如何發聲）、視角（如全知視角、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等）、聚焦、語法（如敘事的序列與事件如何鋪陳）、母題（motif）與原型（archetype）、論述內容（discourse，如敘事結構、時間長度、修辭等；以上均引自何純，2006；另可參閱曾慶香，2005），其複雜程度遠非現有大眾傳播理論所能比擬，卻對其未來研究發展方向極有助益。

一般而言，敘事研究並不強調「客觀性」，但重視故事述說過程之情感如何抒發、經驗如何交換、自我如何展現、時間空間扮演何種特定角色，因而已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引發諸多前所未有之「遐想」（empathy，原意為「神入」），主因即在於其（敘事）非僅是抽象理論，反而是「行動的社區」（communities of action，指其內涵包含了眾多與行動相關的言說活動，見 Faber, 2002），可將人與言說社區連接起來，彼此傾聽對方故事並接受相互之歷史、身份與政治情懷。

而敘事傳播之研究取向實又與實證量化及質化方法皆有接合 (Maynes et al., 2008)，既不介意任何研究結果之「普遍性」原則 (generalizability，如量化研究一向強調者)，亦不擔心研究指標之測量準確性，重點多僅在觀察說故事者自身與故事間的「關係」，藉此體驗故事對其可能產生之生命意義，如哪些事情屬其人生「轉捩點」 (Schroots & Birren, 2002)。

最後，本文猶應引述教育敘事者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 蔡敏玲、餘曉雯譯，2003) 之卓見。他們認為，「教育者的興趣〔當〕在於生活」，而身為研究者的興趣也在「那些活過的經驗——也就是生活，以及生活如何被活過」 (同上引：xvi-xvii)，兩位研究者曾質疑為何「教育經驗怎麼會被看成是某種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測量的東西，……〔以致其〕豐富性與表達性必然因此喪失殆盡」 (同上引：xvii-xxii；添加語句均出自本文)。

以上觀點對傳播研究者／傳播教育者實具啟示：為何過去大眾傳播研究極少討論訊息內容對「人」的生命意義？為何向以資訊觀為主流的大眾傳播理論對「生活」、「人」、「經驗」本質長期不屑一顧？正如 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 蔡敏玲、餘曉雯譯，2003) 所言，其言也善矣：

經驗就是人們生活的故事。人們的生活即是故事，並且在敘說這些故事時，對之加以重新確認、修正，甚而建立了新的故事。活過的和說出來的故事〔既〕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他人，其物件包括年輕的、以及才剛進入其社群的研究者。(同上引：xxii；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綜合言之，本文強調傳播研究 (尤其大眾傳播研究) 植基於社會科學實證理論，其研究目的多在建立法則、定律以能預測並控制社會行為，其以「資訊觀」為核心之後設理論亦多關注「理性」、「客觀」、「正確」、「中立」與「效度與信度」等概念，發展多年以來領域個性已漸趨「剛性」、「嚴肅」、「集體」而與「情感」、「人性」、「生命意義」無關，更與「人」及「生活世界」脫離。但源於社會學術思

潮之變遷及嶄新科技之發展，此類傳統後設理論顯已面臨挑戰，亟應調整以能應付二十一世紀的新起局面。

本文因而建議大眾傳播研究者除了延續傳統「資訊觀」之效果後設理論外，也應視傳播為交換故事的歷程，講述故事者與聆聽故事者在此歷程中係以平等、共有、共享、意義共構方式彼此激勵各自從其生命經驗／記憶裡抽取有趣、美好、值得與對方分享之情節共同營造情境；真實與客觀不復彼此唯一關心的傳播目標，如何達成「好的講述與聆聽理由與內容」方是。在此過程中，想像可被激起而情感可被抒發，彼此分視對方為獨特且與己不同之個體相互尊重，雙方透過各自生命經驗述說進而領略生活世界之存在意義真諦，甚而樂於追求更好的人生目標止於至善。即便大眾傳播內容（含新聞報導）亦是如此，乃因其豐富資訊（如非資訊超載）內容實難再以資訊貧乏時期發展之「資訊觀」解釋，唯以「敘事論」方能說明為何／如何在此「眾聲喧嘩」且「百花爭鳴」時代眾人仍能從中領悟人生意義並享受生活樂趣，或體會人生苦難卻仍持續追求生存真諦。

然而本文所示猶待繼續開拓，畢竟「敘事傳播」概念仍屬初探，深度不足，尤以本文雖強調大眾傳播研究應「向敘事轉」並納入敘事理論／研究／典範精髓，融入敘事視角卻非視傳播研究為敘事領域一支。此外，敘事傳播內涵如何與其他領域區隔（如敘事心理學亦常擅於由「自我」出發探索其如何展現於敘事文本）、如何建構其獨有特色（如是否仍應以自我至文本為核心意涵）、網路興起後對不同媒材講述故事之影響（慣稱「數位敘事」，見陳雅惠，2008.07），此皆有賴持續深究。

註釋

- [1] 台灣傳播教育學界在過去十餘年間針對相關問題亦曾多次討論，見祝建華（2004）、翁秀琪（2001）、陳世敏（2000）、游梓翔、夏春祥（2003）、馮建三（2006）、編輯部（1996）等。
- [2] 「溫水煮青蛙」一詞靈感出自 Rosengren（1993）所撰專文之標題 frog ponds。

- [3] 報紙組迄 2011 年終於通過更名為「報紙與網路新聞組」(Newspaper and Online News Division; 見 http://aejmc.net/newspaper/leadtime/leadtime_winter_11.pdf)。
- [4] 其後美國主流期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亦曾於 1983 年 (Vol. 33, summer issue) 提出「動盪中的學門」(ferment in the field) 專題深入交換看法, 十年後 (1993 年, Vol. 43, autumn issue) 再次針對此一議題延伸討論。較新著作參見北歐芬蘭批判學者 Nordestreng (2004) 之評論。
- [5] Chaffee 在其文均使用問號, 乃因其時 (二十一世紀之初) 眾多現象仍屬徵兆而非事實。如今新媒體之影響愈形明顯, 如 Chaffee 在世恐有更為具體之「預想」(prophesies)。
- [6] 本文稍早版本在中華傳播學會發表時曾獲匿名評審指稱, 「敘事理論已經是傳播理論的一部分, 它跟其他傳播理論一樣, 都代表一種理解傳播現象的角度或觀點」, 但若查閱相關文獻迄今並無「傳播」與「敘事」並存之書籍或論文, 因而本節與下節討論似仍有其重要性。
- [7] 敘事理論 (narrative theory)、敘事學 (narratology)、敘事研究 (narrative research) 三者所示稍有差異, 如前者多指稱較早期在文學領域盛行之敘事研究, 九〇年代以後常以「敘事學」一詞替代, 本文交換使用。
- [8] 本文選擇此四書乃著眼於其與「傳播敘事」間之直接關連程度, 其他相關專書或論文即便與敘事早期發展之語言結構論有關 (如 Labov, 1972; Labov & Waletzky, 1967) 或與批判言說分析有關 (如 Bell & Garrett, 1998; van Dijk, 1988), 均因其與下節有意發展之後設理論相關較遠因而割愛; 感謝匿名評審之指正。
- [9] 有關「社會臨場感理論」之意, 原指媒介提供之訊息能讓人感到「如臨其境」的程度, 係屬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重要理論依據。

參考書目

- 文言（2006）。《文學傳播學引論》。瀋陽市：遼寧人民。
- 何純（2006）。《新聞敘事學》。長沙市：嶽麓書社。
- 吳筱玫（2003）。《網路傳播概論》。台北市：智勝。
- 李天鐸（2010）。〈視野狹隘的傳播學門，無法繪策多變的媒介生態——兼論《台灣傳播再解構》〉，《台大新聞論壇》，9：167-171。
- 李金銓（1988）。《大眾傳播理論》。台北市：三民。
- 李顯立、吳佳琪、游惠貞譯（1999）。《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台北市：遠流。（原書 Bordwell, D. [1987]. *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 New York: Routledge.）
- 林東泰（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225-264。
-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台北市：五南。
- 姚媛譯（2002）。《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南京市：南京大學。（原書 Berger, A. A. [1997].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施力群（2005）。《憑窗對望的想像：論網誌（Blog）中的自我觀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進忠（2010）。〈開創創業研究視野——先行者 Christ Steyaert 介紹〉，《創業管理研究》，5（2）：111-128。
- 胡紹嘉（2008）。《敘事、自我與認同：從文本考察到課程探究》。台北市：秀威。
- 祝建華（2004）。〈中文傳播研究的理論化與本土化〉，陳國明（編）《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 107-130。台北市：五南。
- 夏春祥（2006）。〈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 徐國峰（2004）。《龍魂不滅——傳播儀式中的社群記憶》。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 翁秀琪（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
- 陳世敏（2000）。〈傳播學入門科目的現實與理想〉，《新聞學研究》，65：1-18。
- 陳雅惠（2008.07）。〈探詢數位時代中敘事與媒介之關係〉，「2008年中華傳播學會」論文。台灣，台北。
- 游梓翔、夏春祥（2003）。〈傳播學門的再思考：口傳與大傳的分立史與整合路〉，《中華傳播學刊》，4：109-144。
- 馮建三（2006）。〈試論新聞傳播教育學術正當性的建立：記者養成與媒介素養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69：181-197。
- 黃光玉（2006a）。〈說故事打造品牌：一個分析的架構〉，《廣告學研究》，26：1-26。
- 黃光玉（2006b）。〈書介：不一樣的品牌行銷〉，《廣告學研究》，26：113-126。
- 黃惠萍（2005）。〈審議式民主的公共新聞：建構審議公共議題的新聞報導模式〉，《新聞學研究》，83：39-81。
- 曾慶香（2005）。《新聞敘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 臧國仁、蔡琰（2001）。〈新聞美學——試論美學對新聞研究與實務的啟示〉，《新聞學研究》，69：29-60。
- 臧國仁、蔡琰（2005a）。〈與老人對談——有關「人生故事」的一些方法學觀察〉，《傳播研究簡訊》，42：17-22。
- 臧國仁、蔡琰（2005b）。〈新聞報導與時間敘事——以老人新聞為例〉，《新聞學研究》，83：1-38。
- 臧國仁、蔡琰（2011）。〈旅行敘事與生命故事：傳播研究取徑之芻議〉，《新聞學研究》，109：43-76。
- 臧國仁、蔡琰（2012）。〈新聞訪問之敘事觀——理論芻議〉，《中華傳播學刊》，21：3-31。
- 臧國仁、鍾蔚文、楊怡珊（2001）。〈新聞記者的社會智慧：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新聞學研究》，69：55-94。
- 趙雅麗（2006）。〈跨符號研究：「結構／行動」交相建構中的傳播巨型理論藍圖〉，《新聞學研究》，86：1-44。

- 趙雅麗 (2010)。〈傳播成為一門「意義科學」的想像與準備：跨符號的觀點〉，《中華傳播學刊》，17：307-349。
- 潘慧玲 (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5-143。
- 編輯部 (1996)。〈「新」傳播教育：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新聞學研究》，53：5-7。
- 蔡敏玲、餘曉雯譯 (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市：心理。(原書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蔡琰 (2000)。《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台北市：三民。
- 蔡琰、臧國仁 (1999)。〈新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58：1-28。
- 蔡琰、臧國仁 (2007)。〈「創意／創新」與時間概念：敘事理論之觀點〉，《新聞學研究》，93：1-40
- 戴皖文 (2006)。〈個人化行銷：資訊時代的網路信賴機制〉，《新聞學研究》，89：1-35。
- Bal, M. (Ed.). (2004). *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Barthes, R. (1966/1977).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S. Heath (Ed.), *Image music text* (pp. 79-124). New York: Hill & Wang.
- Basso, K. (1996). *Stories, community, and place: Narratives from middle America*.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ll, A., & Garrett, P. (Eds.). (1998).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Oxford, UK: Blackwell
- Berelson, B. R.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 1-6.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 Bird, S. E., & Dardenne, R. W. (1988). Myth, chronicle, and story: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news. In J. W.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pp. 67-87). Newbury Park, CA: Sage.
- Bird, S. E., & Dardenne, R. W. (1990). News and storytelling in American culture: Reevaluating the sensational dimensio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3, 33-37.
- Bird, S. E., & Dardenne, R. W. (2010). Rethinking news and myth as storytelling.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205-217). New York: Routledge.
- Birren, J. E., & Birren, B. A. (1996). Autobiography: Exploring the self and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In J. E. Birren, G. Kenyon, J.-E. Ruth, J. J.-F. Schroots, & T. Svensson (Eds.), *Aging and 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adult development* (pp. 283-299). New York: Springer.
- Brockmeier, J., & Carbaugh, D. (Eds.). (2001).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rey, J. (198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culture*. Boston, MA: Unwin Hyman.
- Chaffee, S. H., & Metzger, M. J. (2001). The e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 365-379.
- Chatman, S. (1980).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ste, D. (1989). *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ragan, J. F., & Shields, D. C. (1995). *Symbolic theories in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ormann, Burke, and Fish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Craig, R.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 119-161.
- Czarniawska, B. (2004). *Narrativ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ondon: Sage.
- Faber, B. D. (2002). *Community 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mage, narrative, identit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Fisher, W. R. (1985). The narrative paradigm: An e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2, 347- 367.
- Fisher, W. R.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C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Fivush, R., & Haden, C. A. (Eds.). (2003).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J. E. Lewin, Trans.). Ithaca, NY: Th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orgakopoulou, A. (2007). *Small stories, interaction, identitie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 Gergen, K. (1999).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 Gergen, M., & Gergen, K. J. (Eds.). (2003). *Social construction: A reader*. London: Sage.
- Gonzalez, H. (1988).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302-308.
- Gorra, M. (1995). The autobiographical turn. *Transition*, 6, 143-153.
- Greimas, A. J. (1990). *Narrative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discourses*. London: Pinter.
- Gurevitch, M., & Kavoori, A. P. (1994). Global texts, narra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meaning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2), 9-24.
-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 Herman, D. (2009).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 Jacobs, R. N. (1996). Producing the news, producing the crisis: Narrativity, television and news work.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373-397.
- Johnson-Cartee, K. S. (2005). *News narratives and news framing: Constructing political rea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Johnstone, B. (1991). *Wisdom sits in places: Landscape and language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Jørgensen, M., & Phillips, L.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 Josselson, R. (2007). Narrative research and the challenge of accumulating knowledge. In M. Bamberg (Ed.), *Narrative -- State of the art* (pp. 7-15).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 Josselson, R., Lieblich, A., & McAdams, D. P. (Eds.). (2007). *The meaning of others: Narrative studies of relationship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enyon, G. M. (1996). The meaning/value of personal storytelling. In J. E. Birren, G. Kenyon, J.-E. Ruth, J. J.-F. Schroots, & T. Svensson (Eds.), *Aging and 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adult development* (pp. 21-38). New York: Springer.
-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Labov, W., &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p. 12-44).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ászló, J. (2008). *The science of s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 Liebes, T. (1994). Narrativization of the new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2), 1-8.

- Littlejohn, S. 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McQuail, D., & Windahl, S. (1981).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London: Longman.
- Maynes, M. J., Pierce, J. L., & Laslett, B. (2008). *Telling stories: The use of personal narrativ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 G. (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Dialectics of medical interviews*. Norwood, NJ: Ablex.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elson, K. (2003). Narrative and self, myth and memory: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self. In R. Fivush & C. A. Haden (Ed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rrativ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3-2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Nordestreng, K. (2004). Ferment in the field: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 11*, 5-18.
- Onega, S., & Landa, T. A. G. (1996). Introduction. In S. Onega & T. A. G. Landa (Eds.), *Narratology: An introduction* (pp. 1-41). London: Longman.
- Parsons, A. (2009). Narrative environments: How do they matter? *Rhizomes: Cultural Studies in Emerging Knowledge, 19*. Retrieved August 31, 2012, from <http://rhizomes.net/issue19/parsons/index.html>
- Peters, J. D.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527-559.
- Plummer, K.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 Rabinow, P., & Sullivan, W. (1979). The interpretive turn: Emergence of an approach. In P. Rabinow & W. Sullivan (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pp. 1-21).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4). Toward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Narrative Inquiry*, 14(2), 234-260.
-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8).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 Roeh, I. (1989). Journalism as storytelling, coverage as narrative.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162-168.
- Rosengren, K. E. (1993). From field to frog po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6-17.
- Sarbin, T. R. (Ed.).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 Schroots, J. J., & Birren, J. E. (2002). The study of lives in progress: Approaches to research on life stories. In G. D. Rowles & N. 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
- Schultz, A., & Luckmann, T. (1980).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vol. II).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hort, J. A., Williams, E., & Christie, B. (197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van Dijck, J. (2004). Mediated memory: Personal cultural as object of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8, 261-277.
-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he Narrative Approach to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native Metatheoretical Suggestions

Kuo-Jen Tsang & Yean Tsai*

Abstract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the birth of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1940s. The area has recently been criticized for being boring and lacking in creative idea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s new perspectiv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o introduce the narrative approach, which many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have welcomed since the 1990s, and suggest viewing mass communication as a narr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mutual relations, and storytelling through intermediate channels, such as the mass media, rather than as process fulfilling the goals of the message sender. Therefore, one should view the purpo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o express emotion, arouse the imagination, help listen to one another, and build a sense of community, to experience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o beautify the poetic life.

Keywords: mass communication, metatheory, narrativ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Kuo-Jen Ts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Yean Tsai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Radio & Televis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